

“限塑令”的三年之痒

本报记者 余英茂

3年前的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开始实施。这份被人们称之为“限塑令”的通知规定:全国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

时隔三年之后,国家明令禁止的超薄塑料袋在市场上仍随处可见,免费塑料袋重出江湖,超市中免费的连卷塑料袋用量大增,商场更注重卖塑料袋而非“限塑”。面对此情此景,有人戏称“限塑令”遭遇了“三年之痒”,有人认为“限塑令”太温柔,国家有关部门则准备扩大限塑范围。

“限塑令”难以奏效的原因何在?“限塑”的范围是否应当扩大?如何才能达到“限塑”进而减少“白色污染”的目的?这些话题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亦喜亦忧

“要袋子吗?”超市收银员一边熟练地扫描着商品条形码,一边问顾客。这样的情景,每天都在我市各大商场、超市上演着。

在人民路上的丹尼斯大卖场,记者看到,消费者在收银台结账时,大都拿着自备的可降解手提袋或无纺布袋,付费购买塑料购物袋的多是一些年轻人。据了解,“限塑令”实行以前,该店每天要免费提供1.5万个塑料袋,现在可降解的收费塑料袋每天的使用量只有200个左右,超过8成的顾客都是自带购物袋。

在“收费杆”的作用下,超市的塑料袋使用量锐减,“限塑令”发挥了很大作用。东明路上一家超市的收银员路女士告诉记者,“限塑令”实施以来,各大商场和连锁超市对塑料购物袋实行收费使用,小号环保购物袋每只售价约为0.3元,中号的为0.5元,大号的为1-3元,很多消费者已经习惯了自带购物袋来购物。

三年来,“限塑令”取得了一定成效。据一家网站调查显示,有80%的人表示“限塑令”实施后,有意减少了塑料袋的使用,“基本没有减少”的只占18%。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限塑令”实施以来,超市的塑料袋减少2/3以上,全国主要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的年使用量减少了240亿个以上,累计减少塑料消耗60万吨,相当于节约石油360万吨,折合标准煤500多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00多万吨。

与商场、超市严格执行“限塑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众多集贸市场、街头小店、流动摊点普遍免费提供塑料袋,成了“限塑”的“盲点”。

在南阳路上的刘寨综合市场,市场内商贩的三轮车和摊位上,花花绿绿的塑料袋随处可见。无论是买几元钱的菜,还是购买几十元钱的水果,商家都会免费提供塑料袋。记者向一位水果摊主主要来一个摸上去感觉比纸还薄的白色塑料袋,用手轻轻一扯就破了,显然这是国家禁止使用的超薄塑料袋。

记者问摊主这种塑料袋是否属于可降解的塑料袋,“没事,这个塑料袋保证你能把东西提到家,要是不放心,我可以再给你多套一个袋子,一个塑料袋不就是两分钱嘛!”摊主答非所问地告诉记者,他一天要用去近百个塑料袋,成本也就是一两元钱。

市场上那些花花绿绿的超薄塑料袋从何而来?一些摊主告诉记者,大的批发市场有专门销

售塑料袋的店铺,如果不想跑路,塑料袋用完了打个电话,还有人送货上门。在黄河食品城,记者见到多家批发塑料袋的门店,50个超薄塑料袋的批发价为1.5元钱,每只仅合3分钱。

反弹困局

三年前,“限塑令”风风火火推行时,有媒体预言,塑料袋的使用量一时会明显减少,过一段时间后又会反弹,久而久之,塑料袋的使用量会缓慢接近原来的状态……

与此相佐证的是,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的调查显示,在“限塑令”实施第一年,全国农贸批发市场的超薄塑料购物袋使用量最高减少达60%;第二年,仅减少了20%;如今,这一比例降至10%。

“限塑令”规定商家可以免费提供卷帘袋给消费者,用于包装水果、蔬菜、干果等生鲜食品。“限塑令”实施后,我市各个商场、超市的免费塑料购物袋的购买量虽然不多,免费的连卷塑料袋用量却急剧增加。

丹尼斯大卖场的一名销售经理告诉记者,商场免费提供的手撕袋不在“限塑”范围内,很多消费者便多撕几个,将购买的物品装入其中当塑料袋使用。现在,丹尼斯大卖场每月消耗连卷袋2000多公斤,比推行“限塑令”之前多出了1000多公斤,造成了很大浪费,也使“限塑”的效果大打折扣。

经过调查,省政协委员原思国发现,集贸市场是“限塑令”执行最薄弱的地方,兰州、郑州、成都、广州几个城市的集贸市场和批发市场的执行率仅有20%至40%。分析“限塑令”反弹的原因,原思国认为有四大因素:个体商贩执行没有动力,市场监管不完善,生产、销售塑料袋的源头没有得到根本控制,民众的环保意识薄弱。

在公众眼里,“限塑令”执行的效果怎么样?百度调查显示,61.2%的网友认为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自然之友河南小组从2009年起连续两年进行的调查也显示,“限塑令”的辐射范围多局限在大型超市,免费塑料袋已在农贸市场卷土重来。自然之友河南小组项目负责人王克科说,“限塑令”规定塑料袋厚度不能低于0.025毫米,为的是提高塑料袋的利用率,但农贸市场提供的基本上都是超薄袋,很难二次利用。

从起点费尽周折运行一圈之后,却好像又回到了原点,“限塑令”似乎陷入了反弹怪圈。

“痒”在何处

人们曾寄予厚望的“限塑令”,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有人戏称,“限塑



我市伏牛路四小学生表演情景剧呼吁拒绝“白色污染”

令”遭遇了“三年之痒”。

那么,问题的症结在何处呢?黄河食品城的一位塑料袋批发商向记者坦言,自己经营的既有可降解的塑料袋,也有超薄塑料袋,一卷可降解的环保塑料购物袋的价格是7元钱,而超薄塑料购物袋的价格只有一半。为了降低经营成本,大多数摊贩自然愿意购买超薄塑料购物袋,街头的摊贩之所以违规向顾客免费提供超薄塑料袋,为的是招徕顾客,因此可降解的塑料袋很难推广。

在该店挑选塑料袋的一位姓王的女摊贩也附和说:“俺是卖菜的,顾客有时为了一两毛钱还要讨价还价,如果花同样的钱,别人免费给塑料袋,你不给,谁还来买你的菜?”

“您在购物时会使用环保购物袋吗?”问到这个问题,正在黄河路菜市场买菜的市民刘女士回答:“没想过那么多,不管卖家给什么塑料袋,只要能用了就行了!”记者看到,刘女士手里拎了5只塑料袋,薄薄的袋子里装的蔬菜可以一览无余。

这种声音代表了不少消费者的想法。商家免费提供,消费者乐意接受,皆大欢喜之下很多人并不关心塑料袋带来的“白色污染”问题。这种消费习惯,多年来商贩和消费者都习以为常,尽管多数人对“限塑令”表示认同,但习惯并非

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在一些消费者看来,“限塑令”的制度设计并不完善。刘女士认为,“限塑令”只是把无偿提供塑料袋变为付费而已,如今很多超市、商场的注意力已经从“限塑”变为“卖塑”,除了坚持“用塑”收费,难以见到“限塑”方面的宣传,“限塑令”逐渐被很多人淡忘,商家注重“卖塑”很难引导消费者树立环保意识,起不到治本的效果。

推行“限塑令”,目的是减少“白色污染”,但自备布袋等环保购物袋的多为中老年人,年轻人很少关心购物袋是否环保。“塑料购物袋每个两三毛钱,不少年轻人对花钱买个购物袋并不在乎。”花园路上的一家超市的收银员认为,“限塑令”推行效果有限,老年人为了省钱就自带购物袋,不少年轻的消费者却已经渐渐习惯了塑料袋收费使用。

“限塑令”为何在农贸市场、街头摊点难以落实呢?很多人归结为相关部门监管不力。金水区一位不愿具名的工商管理人士向记者大倒苦水说,“限塑”工作由发改委、商务部门牵头,工商、质监、城市执法、环保等多个部门分工协作,质监部门负责塑料购物袋的生产企业监管,城市执法部门负责街头摊点违规使用塑料袋的治理,多部门监管有时很难形成合力。

农贸市场是“限塑”的一大难点,工商人员也经常进行重点检查,商户们却常常与工商管理人士玩起了“猫鼠游戏”。很多摊贩都是准备两种塑料袋,遇到管理人员来检查时就将可降解塑料袋摆上台面,把超薄塑料袋藏起来,“风头”过后又“旧病复发”。而一些小作坊白天生产合格的塑料袋,晚上就调试机器生产超薄塑料袋,执法部门很难调查取证,往往是劲没使使,监管效果却很不理想。

“扩编”之争

另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限塑令”还留有很多死角,推进步伐过于“温柔”,必须完善相关制度,才能实现全面“限塑”。

在日前召开的“限塑令出台三周年”主题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正在抓紧调查研究,准备将书店、餐馆、医院、药店等场所纳入“限塑”范围。同时,实施“限塑令”要纳入全国文明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农村

文明集市的建设考核工作中去,成为一项硬性指标。

对于扩大“限塑”范围,相关各方有何看法?记者电话采访了省会几家大型医院,院方多表示从医学角度考虑,“限塑”有利于减少“白色污染”,保护生态环境,赞成扩大“限塑”范围。很多饭店经营者也表示,饭店打包现象比较普遍,如果顾客为打包的塑料袋买单,也许能够相应地减少塑料袋的使用量,饭店则可以节约成本,一举多得。

一些市民认为,眼下扩大“限塑”范围时机还不成熟。在黄河路农贸市场买菜的市民李大妈说:“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以后到饭店吃完饭打包剩菜回家,到药店买药使用塑料袋也可能收费,现在市场上超薄塑料袋到处都在免费使用,这一块都没有管好,再扩大范围我觉得也许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塑料袋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便利,一时并没有更好的替代物,这是制约“限塑令”推行的一大重要因素。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李静近日指出,“限塑”替代问题需要深入研究。“限塑令”实施后,以无纺布购物袋为代表的各种“环保袋”应运而生,但这种购物袋在生产过程中要比生产塑料袋消耗更多的原料,应鼓励重复、多次使用,滥发、滥用环保袋将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

“消费者应当重拾布袋子、重提菜篮子!”针对“禁塑令”出现的反弹现象,省政协委员原思国在省政协会议上“献计”说,要利用多种媒体广泛宣传,提高老百姓的环保意识,让公众意识到“白色污染”的严重性,引导大众逐渐养成少用、重复利用购物袋的习惯,形成循环经济的消费理念;从塑料袋生产源头上加以严控;还要对超市生鲜区、农贸市场、蔬菜批发市场等塑料袋“泛滥区”加大监管力度。

超薄塑料袋因为方便、便宜有其存在的基础,要解决目前“禁塑令”所面临的困境,省商业经济学会秘书长宋向清认为,必须打出“组合拳”:一方面,要采用打击和控制手段,严格控制生产环节,打击违规生产超薄塑料袋的黑作坊,严格监控批发、零售、消费等环节。同时,政府职能部门要组织科技人员大力开展攻关,研究和开发塑料袋的替代品,尽可能地降低产品成本,增加消费者的使用便利性,这样才能收到治本之效。



志愿者在街头派送环保购物袋 (均为资料图片)

新闻时评

社会公平关系到中国未来

近日,温家宝总理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题为《未来中国的走向》的演讲。温家宝从经济、法治、政治、文化、责任多角度勾勒出未来中国走向的图景。

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演讲。演讲中所说的“经济发达、人民富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开放包容、文明和谐”等内容,较为完整地表达了中国的路线,回答了“中国要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样一个海内外都相当关心的重大问题。演讲既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的价值理念,也让中国国民看到了国家建设的方向。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实现国家前进的远景目标,来自于具体的努力,对当前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从各种信息综合来看,中国目前最大最亟待解决的,是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

对这一问题,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认知或体验可能不尽一致。公平与公正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至少在知识阶层已经达成共识,但在更广大社会群体比如在中低收入阶,对一些观念的价值认同未必那么积极。对更多人来说,具体的不公不义之事,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直接对应着对公平与公正的理解与诉求。不公平不公正引发了强烈社会情绪,在许多事件中都能感受到这种情绪。

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需要正视,更重要的是要切实解决,仅仅停留在观念领域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化、思想分化乃至阶层分

教授治校是为回应“钱学森之问”

虽然南科大坚定改革信心,以大手笔“破冰”,但依然是一波三折。继三位香港教育研究

人员离去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24日表示,该校计划在今年年底招聘300位教授,坚持教授治校。(6月25日《新快报》)

在本土做什么事都难,做教育之事更是难上加难。虽然有人把本土教育发展夸成了一朵鲜花,但事实就是事实,好听的话难掩事实的无力和苍白。“钱学森之问”无疑是沉重之问,涉及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现在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办大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出大师,大师和杰出人才都培养不出来,那么,大学所办的就是难堪。

改革需要取固者的承担,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谋划教授治校,使教授治校逐渐具体化,就是在承担改革的责

城管名声在外带来对其审视新视角

任。教授治校,这是在坚持一种办学的理念,同时也是在对“钱学森之问”作出回答。“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这是钱学森在给出了问题的同时,亦给出了答案。现在的大学之所以培养不出大师和杰出人才,千条万条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由行政官员治校而不是由教授治校。行政干扰过多,大学趋于衙门化,越来越像官场,不仅造成精神上的自我矮化,办不出一流大学,也使出大师和杰出人才成为一种不可能。

在某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方某校长问哈佛大学校长怎样办成一流大学,结果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办成一流大学,我只知道怎么办不成一流的大学,如果行政的干扰太多,在学术探讨上,大学生与教授没有平等的对话,就办不成一流大学。”教授

治校的理念,就是学生本位与教授本位的理念。冯友兰先生讲,一个大学可以说是独立的,“自行继续”的团体。所谓“自行”就是一个大学内部的新陈代谢,应该由它自己决定、支配,也就是由它自己谈、批评。大学很难办,在现实语境中,难在行政化上,大学也有它的必由之路,那就是教授治校,依照应有的规律办事。

即使在南科大,教授治校也是长路漫漫。改革的成败,全在于能否坚守住教授治校的理念。只有教授治校,才能实现大学精神的回归与提升。只有通过教授治校,才能把南科大建成一所纯粹的回归大学本质的学校,建成以学术为主导而不是以行政为主导的学校,建成能培养出大师和杰出人才的学校。舍此前行的勇气,舍此锲而不舍,那“钱学森之问”在日后长久的岁月里可能还是依然无解。 伊文

种人性化操作,而不是肆意施虐。管理应是化解矛盾的过程,而不是把暴力演绎到街头。一些城市管理者可能不懂得,在一个人治滥权的互害型社会里,人人都逃脱不了被害的命运。城管和小贩是同在一个城管制度设计的受害者。他们是可怜的,作为此一历史时期的牺牲品,他们还是可悲的。

城管名声在外,以至于对他们一些人的暴力执法有这样的分析,“城管之所以会这样做,同他们没有接受充分的培训、收入偏低以及对个人职业前景感到悲观等多重因素有关”。这样的分析自有其道理,说有理,在于它没有与现实脱节。城管管理城市涉及一些重要理念,就是一切的行为结果是使这座城市更文明,还是更糟糕;是有助于改善民生,还是漠视、践踏民生;是使人的存在变得更加荒谬,还是变得更为合理、自足;是使人性得到进一步改良,还是更趋向于恶化。 今语

继“guanxi(关系)”、“hongbao(红包)”成为英美媒体中的“新晋词汇”后,“chengguan(城管)”一词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这显然是因为近期中国多个城市发生涉及城管的公众冲突事件,引起了外界的关注。(6月27日《金羊网》)

所有词语都是有意或无意的语言表达形式。能产性强可以说是当下汉语新词语的一个显著特点,当看到关系、红包等汉语词语也都成为英美媒体新词汇,人们可以得知,英语新词语的能产性亦是相当的强。新词语是生活的一面镜子,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哪里就会反映什么。世界现在是一个地球村,村民与村民之间构成紧密关系。本土的城管凶猛异常,作为一种生动形象,作为一个诠释城市管理新视角的词语,其能成为英美媒体中的“新晋词汇”,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换一个方法说,城管成为英美媒体新词汇,显然是人们愿意对这一“权力

物价比美国高关键在于“干多挣少”

中国学者对比中美物价发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售价比国内同类商品便宜50%。学者认为中国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导致物价居高不下,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欧盟15国的2.33倍。(《中国青年报》6月29日)

这些年,中国游客在海外抢购“MADE IN CHINA”商品的消息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原因何在?不可否认,商品从厂家到市场再到消费者手里,涉及多重的代理商,还要承担各种高额的工商管理税费,所以中国货运渡重洋到了美国反而会便宜——这与中国宏观管理成本较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同时与美国“只消费不制造”的市场环境有关,其实不仅中国货在美国便宜,越南货、印度货在美国也比在本土廉价。

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就算是抛去了“行政管理成本”和种种税负,很多商品在中国的售价还是会高于美国。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的物价之所以构成了巨大的民生压力,一个主要因素是因为国人“干多挣少”。

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直接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正因为社会中普遍存在“干多挣少”,在某种意义上说,比泛泛地“降低税负”更迫切和重要。 陈一舟